

# 2019年“中华环保世纪行”新闻采访组来株采访 18家央媒聚焦清水塘蝶变

本报讯(记者 李卉)昨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新闻局巡视员钟雪泉带领中华环保世纪行新闻采访组来株采访,关注清水塘搬迁改造和污染治理情况。采访组包括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视总台等18家央媒,采访主题为“守护长江清水绿岸”。

## 搬迁改造和污染治理成焦点

采访组深入株冶集团、霞湾港、化四地块等地,详细了解清水塘老工业区搬迁改造工作的方方面面,并就钱从哪里来、企业怎么搬、人往哪里去、污染怎么治、新城怎么建等方面的问题,采访了相关部门与企业的人员。

清水塘是一个承载着历史荣光与辉煌的国家老工业基地,曾经创造了100多项全国第一,累积上缴近500亿元税收。但由于长期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的粗放式发展,也一度戴上了污染的帽子。从2013年开始,株洲举全市之力推动清水塘老工业区整体搬迁改造,截至2018年底,随着清水塘地区261家企业全部关停,成功退出重金属污染重点防控区的同时,湘江株洲段的水质也由2013年的劣Ⅲ类提升到了Ⅱ类以上,全市空气优良天数增加了两个半月。

霞湾港的变化,给澎湃新闻记者刁凡超留下了深刻印象,“从七彩河变成清水河,生动反映了湖南省、株洲市治理污染、保护环境的决心。”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社教中心记者郭东琳围绕收储土地如何进行污染治理、企业关停搬迁之后是否影响株洲经济发展等问题重点展开采访,当听说有不少民营企业以大局为先、主动关停企业的故事后,她深受感动,表示要进行深入采访、讲好株洲故事。



▲采访团记者深入株冶集团、霞湾港等地采访 记者 李卉 摄

## 此次集中采访,在湖南共有4站

2019年中华环保世纪行活动,以“守护长江清水绿岸”为主题,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紧扣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监督重点,回应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关切,推动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根据安排,赴地方采访时间从6月份开始,中央和相关地方的新闻媒体记者分别赴长江沿线6省份,即上游的青海、四川,中游的湖北、湖南,下游的浙江、上海,到水污染防治的源头、一线,

进行深入采访报道。目前,赴青海四川的新闻采访活动已完成,对湖南采访时间从7月28日开始,为期4天,采访地点包括长沙、株洲、岳阳、益阳等地。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新闻局副局长胡牧,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谢卫东,省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委员石光明,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冯建湘陪同采访调研。

## 市民之声

### 整治乱摆乱停,并非“小题大作”

□ 马新声

7月26日早上8点多,铜塘湾街道城管队员巡查发现邓某将一辆小货车违停在人行道上,占道贩卖西瓜。城管队员上去劝导,邓某连续两次拦截执法车,抢夺执法记录仪,自己倒地谎称城管打人,还将执法人员踹倒在地,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10日。(详见本报7月29日A07版)

近年来,市民对生活品质有了更高要求,我市文明城市的建设,正是顺应了市民的这种需求,确实让市民得到了实惠。作为我省首部设区市的地方法规,《株洲市综合管理条例》的出台,正是充分体现了我市城市管理者对城市治理工作高屋建瓴的思考与顶层设计,也反映了广大市民的心声。但部分市民却难以从发展的高度和法律的层面,理解乱摆乱停等现象对城市秩序造成的危害,甚至会误解城管队员“小题大做”。

乱摆乱停等现象,根源是观念上的认知不足。这些陋习,在过去没有被上升到法律的高度,远不如偷窃等违法行为被人们所认知。而摒弃顽固的落后观念,培养文明习惯,形成规则意识,是一个艰难扭转与适应的过程。这就给城市治理工作带来了难度。殊不知,如果不能纠正这些陈规陋习,干净的街道、有序的城市、井然的秩序就无法形成,如果任其发展蔓延,就更可能陷入无序,直接影响市民的生活品质和幸福感。

笔者认为,建设新时代全域化更高水平文明城市,需要全体市民形成理解与支持城市治理的共识与氛围。在为执法者立规矩保证文明、公正执法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对执法者的保护,对不听劝阻的违法者和阻挠执法者,要依法严肃处理,让他们付出应有的代价。

## 评天下

### 线上线下一盘棋共治校外培训热

□ 杨三喜

日前,教育部等6部委联合发布《关于规范校外线上培训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规范校外线上培训。这是在国家层面颁布的第一个专门针对校外线上培训活动的规范性文件,《实施意见》对线上培训师资、培训内容、培训时长、收费方式等提出了具体的规范,要求建立全国统一、部门协同、上下联动的监管体系,采取“互联网+监管”的新模式,用互联网的方法来解决互联网的问题。

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在线教育发展存在很多问题,诸如收费不合理、师资不规范、超前超纲教学、强化应试训练、内容鱼龙混杂,不仅违背了教育规律,加重了学生课业负担和家庭经济负担,也扰乱了正常的教育秩序,对教育生态带来了负面影响,刺激了校外培训热和教育焦虑。

《实施意见》提出要用“互联网+监管”新模式,通过建设全国校外线上培训管理服务平台,依托平台对校外

线上培训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动态监管,顺应了线上培训服务这一新业态的特点和发展趋势。比如,通过公开师资、课程等方面信息,构建一个开放、透明、公平的消费环境,通过技术手段加强对培训机构培训行为的监测,通过数据分析技术对培训行为进行智能研判,从而减少监管人员工作量,提升监管工作有效性。

线上培训固然是一种新业态,但是背后的深层次问题却还是老问题。择校差距大,导致择校需求仍很旺盛,刺激着家长让孩子抢跑、提前学;另一方面,校内吃不饱,难以满足孩子多样化、个性化的教育需求。所以,推进校际均衡、化解择校热,深化招考制度和评价制度改革,提高校内教育质量,强化课堂主阵地,做好课后服务工作,从根本上疏解线上培训需求,尤其是学科培训需求,方是治本之道。而这也有利于引导线上培训朝着为中小學生提供更多丰富、多元的综合类教育产品方向发展,引导线上培训机构发挥好学校教育有益补充的作用。

## 微信读报



网友“殷慧”:  
株洲人民好样的,满满的正能量。

网友“蒋瑞亮”:  
为郑璇小姐姐点赞,虽然你上班迟到了,跟领导说一下因为路上有突发状况,他(她)不会扣你全勤奖的,郑璇小姐姐好样的!

网友“风雨雁归来”:  
你们温暖了整个株洲,为你们点个赞!

(评论版欢迎投稿,已发稿的作者请联系本报编辑部领取稿费。)



▲清代湖南贡院外墙(资料图)

科举制度是封建社会选拔官吏的正途,始于隋,发展于唐,盛于明清。历代攸县人参加童试、乡试、会试、廷试四级科举考试,出类拔萃者不胜其数。

## 童试

乡塾启蒙,无论年龄大小,均称儒童或童生。童生必须参加县试、府试、院试,三案合格者称“生员”,俗称“秀才”。县试由知县主考,府试由知府主考,院试由省学政主考,考试组织严密,录取名额有限。清雍正三年(1725年)以前,攸县录取生员的限额为15名。雍正三年,皇帝下诏令,郡县学风优秀者,可增加若干名。攸县邑绅朱世荣,认为攸县学额可广,具呈省督,省督于是给攸县增加5名,此后厘定攸县生员每届录取数为20人。清康熙年间,督学蒋慎斋来长沙主持郡试,得攸县陈之馥卷,惊叹为“鹰翻摩空,鸡彝在望”。陈之馥与攸县另一位生员单羽臣被拔为前列,有“十二城两秀才”之誉,攸县才子一时名动湖湘。取得“秀才”资格者,可在县学、府学或州学继续深造,均称“入泮”。“入泮”成绩最优者,享受公粮,称“廩生”;不享公粮者称“增生”;初入府、州、县学称“附生”。在府、州、县学的秀才必经科考(取得高级应考资格的预备考试)及格者,方可参加省会举行的乡试。清顺治丁酉(1657年),入清以来第一次乡试中举者,攸县的邓永芳、龙起田,就是从“廩生”参考的。



▲清代湖南贡院旧址说明(资料图)

## 乡试

明清两代每三年一次在省会(包括京城)举行的考试称乡试。乡试在八月举行,故称“秋闱”,“闱”即考场。应试资格有府学、州学、县学生员科考及格者及其他送选者。逢子、午、卯、酉年开考的叫“正科”,遇庆典加科的称“恩科”。考试由礼部派员主持,考后发正榜,凡录取者称“举人”。前五名称“五魁”,“五魁”第一名称“解元”,第二名称“亚元”。

举人有文科、武科之分。据清同治《攸县志》记载,明清以来攸县文科举人112人,加光绪年间谭西泉、龙际云、龙潭、龙涛霖、康刘煌、符勋相、易翔、龙绥年等8人,合为120人。宋元明清以来,攸县文科举人共248人,其中乡试第一名(即解元)者有5人,他们是:元天历己巳科(1329年)谭圭,元元统癸酉科(1333年)陈毓,明洪武甲子科(1393年)贺守真、明永乐戊子科(1408年)李子春、明正德丙子科(1516年)罗星。

中乡试第二名(亚元)者有6人,他们是:明隆庆丁卯科(1567年)蔡思位、清顺治庚子科(1660年)蔡寿生、清康熙辛卯科(1711年)刘森、清雍正丙午科(1726年)张光甲、清乾隆庚寅科(1770年)张祖穆、清道光辛卯科(1831年)文舒敷。

明清时期,攸县武科中举者34人,其中为解元者有:清乾隆丙辰科(1736年)文承彩、清乾隆戊午科(1738年)旷经邦、清乾隆庚午科(1750年)陈兆兴。

自元皇庆二年(1313年)恢复科举考试至清光绪废除为止的近600年间,湖南164场乡试中,每16场就有一名攸县人夺魁,获解元称号,夺魁人数排在全省前列。

## 会试

每三年集各省举人在京城考试,称会试。会试由各省派公(官)车送举人进京,因此举人进京会试称“公车”。正科逢乡试第二年春在礼部贡院举行,因多在3月,故称“春闱”。第一名称“会元”,取录者称“贡士”,也称“试进士”。贡士参加由皇帝主持的殿试。攸县在会试考中“会元”者,有元至正甲申科(1344年)皮嵩,明正统年间刘定之,清顺治戊戌科(1658年)邓永芳。

## 殿试

会试之后,旋即举行殿试,由皇帝在宫廷内亲自面试,也称廷试。殿试分一、二、三甲取录,取录者具称“进士”。一甲取3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一甲进士取录后立即授官。二甲、三甲分别取录若干名,赐“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分别授官。

攸县自宋至清末成进士者82人,其中宋元22人,明29人,清31人。最早中进士者是北宋太平兴国八年(983年)樊未科的文元望、文元美兄弟;此外,涑田蔡家四兄弟蔡承植、蔡思穆、蔡永甲、蔡承向分别于明万历庚辰(1580年)至万历戊戌(1598年)连续四科四中进士。龙塘刘三策、刘蛟、刘俊3人分别于清康熙壬辰(1652年)庚辰(1700年)联捷进士。

史载,攸县没有考中状元的。但查阅攸县《龙塘刘氏七修族谱》,据载“明正统壬戌(1442年)廷试,龙塘刘俨为状元及第,授翰林院掌院学士”;明景泰辛未(1451年)廷试,龙塘刘升为榜眼及第,授翰林院编修;明成化丙戌(1466年)廷试,龙塘刘定之为探花及第。龙塘刘氏于元末初由江西永新炎村迁攸县高和,定居龙塘。始祖刘兴生,字石湖,号牛山学士,颇有远见,在白鹭山创白鹭书院,培育县里的学子成才。书院办得很有特色,明云南布政使何楚英、兵部右侍郎王伟等就是通过白鹭书院学习后,中进士而踏入仕途的。后来王伟在题《龙塘八景》诗中,对白鹭书院特加赞誉,称刘氏子孙(从龙塘白鹭书院)中试为官者不计其数。

攸县第一位探花,是元泰定甲子(1324年)廷试第三名的柏树下泉塘的张公大。张公大(1296-1385年),别号罗浮居士,以性格憨直疏略,不为当事所许,探花及第后,授广西大和州判。当时的知州喜怒无常,张公大以廉平辅佐,获得当地儒民赞扬,后升杭州太守。时杭州民生凋敝,鄙而侈靡,张公大效白居易、苏轼以俭素为民,以身作则,使民日丰。

由进士而入翰林院者,攸县有10人。翰林院为文翰荟萃之地,始设于初唐,至宋称翰林学士院,为翰林学士供职之所。明代将修史、著作、图书等事务并归翰林院。清沿明制,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编修;进士前列者授翰林院庶吉士。庶吉士在翰林院经过学习,成绩优异者,可升授翰林院编修,或为翰林院检讨。不能升者,分任主事、中书、行人、博士、推官、知州、知县等职。

攸县入翰林院任掌院学士(翰林院长官)者,为明正统年间的刘俨;为翰林院编修者有明景泰年间的刘升、明正统年间的刘定之、清同治年间的龙湛霖;为翰林院检讨者有明宏治年间的易舒造、清乾隆年间的陈梦元、清嘉庆年间的刘昌期和谭国仁;任翰林院庶吉士的有明正统年间的王伟、清道光年间的夏恒、清同治年间的刘常德。最未进入翰林院任检讨的是清嘉庆己巳殿试中进士的谭国仁。他善诗词,值皇帝诞辰,作《恭庆万寿呈七律十二首诗》,其中第四首云:“菲材何幸际昌隆,雨露分沾帝里中。竿挑潘溪成皓首,葵依魏阙抱丹衷。随班雀跃恩光照,锡宠鸿扶礼数崇。敬缀芜词宣蹈咏,涖溪激艳醉春风。”这首诗叙述他71岁中进士入翰林,对皇上的感恩之情。据称,嘉庆皇帝看到所呈之诗,十分高兴,下诏给他加升三级。从谭国仁古稀之年入翰林一事可以看出,封建社会读书人为求得一官半职在科举这条独木桥上付出的艰辛和努力。